

王阳明和章学诚：史观与时代

罗衍军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王阳明和章学诚分别作为明代和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二人的历史观值得深入探究。在对历史变迁的思考方面,王阳明侧重“致良知”,章学诚侧重“究世变”;在考察历史嬗变的意图方面,王阳明重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章学诚重在“以史载道”,顺应王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在君民关系方面,王阳明认为“君之存亡,有系于民”,重视民众在历史变迁中作用的发挥,章学诚则重在阐明“圣王得位行道”,意在彰显现有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王阳明、章学诚历史观的歧异,既与二者的人生历程有关,更是时代嬗变在士人思想领域的映射,其中正隐含着明清时期在社会建构、思想整合、文化取向等方面的变迁轨迹。

关键词:王阳明;章学诚;历史观;时代变迁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4-0096-08

收稿日期:2026-05-20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项目(16JDGH115);越地史学史;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2025年入库在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公共外语教学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罗衍军(1977-),男,山东郓城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4.013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其为阳明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思想家,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作为明中期和清中期的思想家、史学家,王阳明、章学诚二者的史观既有相通之处,又具有明显的差异之处。笔者在此通过阐述二者史观的异同,阐释史观嬗变与时代变动的内在联系,祈方家指正。

一、“致良知”与“究世变”

在对历史变迁的思考方面,王阳明侧重“致良知”,同时认为历史书写应因时而变。章学诚强调“究世变”,其重心则在于会通,即主张通过历史撰述实现“百川归海”。

王阳明强调通过个人修养和自省达到“致良知”,凸显了学人思维的自主性。他认为,至善须求诸于心,“心即理也”,注重“去人欲,存天理”,强调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自我判别事物演变。

在与弟子的对话中,王阳明阐明了经由求诸于心以致良知的具体途径。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

在王阳明看来,“道心”发自于人之内心深处,并坚持不懈,圣人之学,即在于其将良知发于内心深处,

^①[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并且贯彻始终,良知即天道,古之圣人之能致良知,缘于其坚持本心。“尧舜兢兢业业,成汤日新又新,文王纯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阴之功,宁独大禹为然。”^①王阳明强调人自主意识重要性的主张,在明朝正德、嘉靖时期一经提出,在被原来程朱理学所禁锢的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②。

王阳明认为,历史撰述应合乎时代制度、思想等的变迁,因时而变。他以孔子作《春秋》阐述说:“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③同时,王阳明亦存在一定的复古意识,主张回到“三代之治”,其变迁史观存在欠缺之处,“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④。

王阳明指出,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因时而变,这就意味着历史书写亦要因应时代变化,以反映历史的嬗变。他以尧、舜、周公、孔子为例说明,“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⑤。同时,他又指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乃人心之常道,乃是历史变迁进程中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⑥。

在此之前,史学家常因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僵化的纲常礼教作为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尺,造成历史撰写因循不化的现象。王阳明学术撰述要应时而变的主张,对中晚明史学的变革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中晚明历史学者的自主性大为增强,对于原来已形成定论的一些历史人物亦给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对冯道、谯周的评价,起先的学者多从臣节等方面理论,将他们视为异主求荣、毫无臣节的贰臣而加以否定,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从安民、养民的新视角出发,将二人视为承担安民养民责任的臣子,予以充分肯定,其观点具有相当的颠覆性,“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谯周之见,亦尤是也”^⑦。

与王氏相较,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正是号称康乾盛世的乾隆统治时期,士林的思想正从明末清初的激荡交融状态演化到一个建构统合的阶段,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以服务于清政府的大一统秩序,成为此时帝王统驭士林、化育民众的重心所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即与这一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其史观的侧重点在于将历史变迁置于大的时空中进行系统考察,主张通过历史撰述实现“百川归海”。

治史贵通,是中国史学自古即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⑧。郑樵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史风格,在《通志·总

①[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68页。

②[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清康熙刻本(《小心斋札记》第三卷)。

③[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页。

④[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0页。

⑤[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2页。

⑥[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54-255页。

⑦[明]李贽:《李贽文集》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99页。

⑧[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

序》中云：“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郑樵力主“通古今之变”，撰成《通志》这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著作，然而成书后，颇受后人讥评。章学诚通过对历史撰述的深入考察，为郑樵《通志》辩护，主张历史撰述应“百川归海”“成一家之言”。他阐述了历代撰史历程，高度评价郑樵的会通撰史风格，“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②。

章学诚主张以发展变通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指出通史糅合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各史书体例之长，而又“自为义例”，杂糅数个断代史的史书编纂方式，乃是集史，并非真正的通史，“盖通史各溯古初，必须判别家学，自为义例，方不嫌于并列，否则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③。他认为，撰史的主要意图在于记人记事，鉴往知来，“盖史以纪事，事出于人，人著于传，凡史莫不然也”^④，“史志之书，记事为主”^⑤。他将治学的重心放在阐述史学编纂的方法与原则上，以图建立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史学会通古今的作用。故他说：“吾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解。”^⑥他孜孜以求的，是完美融合各家史例之长，发凡起例的通史类著作，“仍记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⑦。他提出具体的撰写方法，以实现通史撰写“百川归海”的目标，“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⑧。

二、“经实务”与“重史纂”

基于对历史兴亡经验教训的深刻体认，王阳明与章学诚均强调正风俗、救弊陋，但王阳明回顾历史的重心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章学诚考察历史撰述嬗变历程的意图则在于服务于当前历史编纂，“重史纂”，以史载道，而非寻求对时代问题的具体因应之道。

鉴于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王阳明对当时社会的颓靡之风忧心忡忡，疾呼“皆有可虑之实”，呼吁正人心，提出正忠信、贵廉洁、重朴直、论心术、尚狷介的主张，“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尝不以风俗为首务，武王胜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尧、舜之后；下车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当是时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于为是者，诚以天下风俗之所关，而将以作兴其笃厚忠贞之气也。故周之富强不如秦，广大不如汉，而延世至于八百年者，岂非风俗之美致然欤！今天下之风俗，则诚有可虑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汉之末，其风俗失之懦；东汉之末，其风俗失之激；晋失之虚；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风俗，谓之懦，则复类于悍也；谓之激，则复类于同也；谓之虚，则复类于琐也；谓之靡，则复类于鄙也；是皆有可虑之实，而无可状之名者也”^⑨；“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从而重之；所贱者，廉洁也，必从而贵之；所轻者，朴直也，必从而重之；所遗者，心术也，必从而论之；所鄙者，狷介也，必从而

①[宋]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序言第1页。

②[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

③[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1页。

④[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320页。

⑤[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895页。

⑥[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92页。

⑦[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81页。

⑧[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52-53页。

⑨[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66页。

尚之”^①。可见，王氏意在通过探究历史得失，以厘正风俗人心、祛除社会弊端，挽救中晚明社会趋于衰落

的状况。

章学诚探究历史变迁的落脚点则在于为当时的历史撰述服务，以史学撰述影响世道人心。

章氏强调历史的撰述要反映时代的变迁，治史风气的变动正映射着历史自身的嬗变，治史贵在“持风气”，而非“徇风气”，“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蔽；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蔽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诋；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②。他批评只偏重考证或义理之一途，“各分门户，交相讥议”的现象，指出这样则会导致“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文章的考证在于“实此义理”，治史需将二者结合起来，“事非有异，何为纷然？”^③

章学诚对文史关系的阐述，正反映了他对治史过程中“器”“道”关系的认识。章氏所指之“文”，具有两层意涵：一是指作为一种学科门类，即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言的“文学”，一是指记载一定内容的文字表现形式。章学诚认为文学是与史学、经学、诸子学相区分的一种作品形式，这实际上是沿用传统上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的区别正在于它具有“自以其意为言”的特点，故“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后来文学作品即包括诗在内，而史家之撰述则“惟恐出之于己”，故必言出有征，“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④。文学与史学各有其特色所在，文学重在其创新性、独特性，故忌模仿他人陈言，史学则贵在“陶铸群言”^⑤，不可随意撰述。正是基于维护历史真实性的立场，章学诚认为历史演义应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⑥

在章学诚看来，“史”通过“文”来传道，“文”是“史”的载体，没有“文”，“史”之体则无由表达。同时，“文”又是为“史”服务的，不能以“文”损“史”，从而失掉了史之“道”。^⑦ 撰史要达到的目标乃是文质俱佳，“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于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⑧。在文质关系方面，他强调不能以私意损害历史真实，如历史撰述文辞华丽，但内容以伪乱真，则会危害史学的本质，导致“史学不亡而亡”^⑨。故而，他痛惜于官学失守而导致的私学泛滥的状态，认为这样将导致“大道不倡”“师失官守”的局面。^⑩ 他阐明，史学著述要客观反映历史现实，“深于忧患”，服务于国家公意，而不能妄托于忧患，阐述其私意，“不知忧患，而妄有所著，皆非可与言文字者也。本无所解，而妄托于忧患，乃如金石之无故而鸣，鸟兽之不驱而骤，是为妖孽而已矣”^⑪。

章学诚将方志视为历史编纂的必要一环，给以相当的重视，“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⑫。他认为方志以“具体而微”的地方史完善国家历史的撰述。^⑬ 他强调州县之志乃国家史事的

①[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67页。

②[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54-155页。

③[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224页。

④[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125页。

⑤[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611页。

⑥[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397页。

⑦[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21页。

⑧[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01页。

⑨[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30页。

⑩[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9页。

⑪[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401页。

⑫[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782页。

⑬[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73页。

重要部分，应于州县设立志科，专门从事于方志的编纂，以加强史学编纂的队伍，充实史书编纂的内容。^①同时，他认为史志的编纂要“加以采辑，广为传述”，为“穷乡僻壤”之“畸行奇节”者以褒奖，以“有裨风教”^②。

世道的流变，对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无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清政府通过史书编纂以重塑士林意识，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之时，通过“厘正文体”，撰述符合“道”的史学论著，以“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正符合了帝王治世之深意，“以‘质’抑‘文’还通过‘厘正文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在乾隆帝的眼里，士子撰写文章担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并且‘与政治相通’”^③。章学诚对文质关系的阐述及方志编纂的重视，正暗合了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流变。

三、“君之存亡，有系于民”与“圣王得位行道”

在君民关系方面，王阳明认为“君之存亡，有系于民”，重视民众在历史变迁中作用的发挥，章学诚则重在阐明“圣王得位行道”，意在彰显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王阳明提出“君之存亡，有系于民”，认为历史书写在于“明善恶，示训戒”“彰善杜恶”。面对当时社会风气的颓靡，王阳明提出“易风俗，正人心”，对正德皇帝耽于玩乐、荒于国政的行为进行直言劝谏。

在王阳明看来，君民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偏于一面，民固然要从于君，君亦要应乎民，“君者民之主，君好于上，而民从于下，固亦理之必然欤！是则内外上下本同一体，而此感彼应，自同一机，人君之于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论之，身固必从乎心矣；民固必从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系于身，而君之存亡，有系于民乎？为人君者，但知下之必从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系于下，则将恣己徇欲，惟意所为，而亦何所忌憚乎？”^④历史撰述要发挥“明善恶，示训戒”“彰善杜恶”的作用，“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⑤。

正是基于君王当为民表率，君明方能臣贤民良的观念，王阳明对其时的正德皇帝耽于玩乐、荒废国政的行为直言进谏，指出这将导致四方之民日兴怨怼、四方盗贼日益猖獗的局面；正德于后苑训练兵事并不能威慑寇盗，反而会损耗国家元气，使群臣惶惑、两宫忧危；正德不能日近儒臣、讲论道德，反而沉迷于骑射疲劳之事，必使国政日益荒废。他直言批评正德皇帝的治国之失，劝谏其须振刷国政，励精图治，以恢复国家元气，振刷臣民生气，这无疑是王阳明将其历史观直接应用于现实国家政局的明显例证。“陛下有尧舜之资，臣等不能导陛下于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额相告，归咎怀愤，若汉、唐之季，臣等死有余罪矣。伏愿陛下继自今味爽以视朝，励精而图治。端拱玄默以养天和，正《关雎》之风，毓《麟趾》之祥。日御经筵，讲求治道，务理义之悦心，去游宴之败度。正臣等不职之罪，罢归田里，举耆德宿望之贤，与共天职。使天下晓然皆知陛下忧悯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极言切谏，以至于斯。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上以承祖宗之鸿休，下以垂子孙之统绪；近以慰臣庶之忧惶，远以答四方之观向”^⑥。

相较而言，章学诚阐述历史变迁，则侧重于对当时统治秩序必要性、合理性的阐释，意在表明最高统治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89页。

②[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821页。

③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98页。

④[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54页。

⑤[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0页。

⑥[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017页。

者正是“得位行道”的“圣王”。

在《文史通义》之《易教上》开篇，章学诚开宗明义地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未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此处“史”实指官学，并非指历史撰述或史料而言，“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②。章氏“六经皆史”说无疑蕴涵“以史学经世之义综合知识与道德”^③之意，史学之所以经世，即在于其契合了变动不居的事物运行规律——道，道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道因器显，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事物的变迁规律是派生的，没有器就没有关于器的道。正是在对“天下事物、人伦日用”的器之探究中，历史变迁之道彰显出来，器变，道亦因时而变。他考察圣人创制的历程，阐述了“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行而渐著者也”的道变观，阐明：“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④

章氏认为，史学之所以经世，并非因其空言著述，而是因其切合当时人事，道随世而变，史家之撰述，正在于明道。章学诚所阐述的史“道”，是将皇权专制时代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也视为道，“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⑤。在章学诚看来，史家自身并非是史学道统的真正掌控者，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撰史者以文害质、以私意害公意，不能服务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故他认为道统创立和掌控权力应该是“圣王”“君”，即各个时代的帝王，因为只有他们方能“得位行道”，以维护和延续现存社会制度的运行，“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⑥。他认为，六经、典制等皆圣王得位行道，“经纬宇宙之迹”，孔子因有道无位，故“述而不作”，其《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诸儒因尊孔子之文，方将其列为经，以有别于后儒所撰之传记，“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⑦

既然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难以继承道统，那么其后的儒者更不能胜任这样的职责，能够为典为经者，则必然归于“有德有位”的当世“圣王”。章学诚把道统的掌控寄望于帝王身上，希冀以此整合与维持社会的运行。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的民族主义心态，至乾隆时期亟需消解，而归于大一统的“兴朝”秩序。章学诚对史道的阐扬，典型反映了在控制日益紧密的王朝治理秩序下，儒者内心之坚守被扭曲的历程，这从章氏对风俗流弊的抨击及当时政教制度的趋附、拥护，可明显看出。“第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⑧。

沿着圣王得位行道，儒者无位行道则必私意害公的理路出发，章学诚认为史的阐释权归于现实的圣王而非拥有知识的儒者。这种儒者内部的压制自主言说、归化与认同现存统治秩序的趋向，在章氏对真遗民心态须“哀而不怨”“忠厚而悱恻”的阐述中得以彰显，“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

②[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72页。

③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20页。

⑤[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47页。

⑥[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43页。

⑦[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3页。

⑧[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36页。

民也”^①。葛兆光指出：“从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七十余年中，清朝统治已经巩固，而时光的流驶，又磨销了史学家对于故国的追怀和对于亡国的痛愤，旧的亲历变故的一代逐渐亡故，带走了最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对明代历史最深刻的反思，新一代对这种情绪和反思日益隔膜”^②。章学诚对于清朝统治正当性的拥护与赞扬，正鲜明地揭示了这一变动，“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而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③。因之，“他只相信现存制度具有整合政治、社会秩序与维系心灵纯净的能力”^④。章氏史学经世观的内核正在于：“并非鼓噪命短的维新变革，而恰恰是主张细水长流般维系既定的统治秩序。”^⑤

四、王阳明、章学诚史观异同的内在缘由

比较王阳明、章学诚的历史观，透视二者之所以有上述异同点，无疑有其内在缘由。

一方面，是缘于人生历程对各自史观的影响。由王阳明、章学诚的生平可知，人生历程的差异对各自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仕宦经历丰富、军功卓著，同时具有独到的学术思想建树，其历史观既重视历史的嬗变，又关照个人修养的完善与内心的自省，主张“致良知”，同时忧心时局、世风的蜕化堕落，因而提出匡正人心、振刷国政、挽救危局的主张。王氏历史观双重关照的形成，显然与其长期在各地任官，对国政荒废、世风颓靡的弊端更为关注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王氏历史观所存在的复古倾向也正凸现了其时代现实的忧虑。与之相比，章学诚虽先后考中举人、进士，但始终未曾真正入仕，其生平重心乃在于史学理论的撰述和方志的编纂，史观更侧重于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历史撰述体系的完善，而非提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国家统治秩序的差异。在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叶，正处于危机频发，明朝统治盛衰交替之时，“社会矛盾尖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剧烈，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地方藩王接连反叛，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⑥。因之，王阳明之史观，便凸显出对世人自身修养的重视，强调匡正人心、挽救王朝危局，对于正德皇帝荒废国政的行为，他亦直言进谏、力陈其非。“王阳明‘治世’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治心’，体现出浓厚的‘以心挽世’的理论与实践倾向。”^⑦在对臣民关系的认识上，王阳明提出“君之存亡，有系于民”，重视民众在历史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王氏主张人的认识要因应时代变革，而非一成不变，但其对当时的时代状况忧心忡忡，其“经世”观并非缘于对其时统治秩序和社会状况的认可，而是出于对社会弊端的深刻反思。当然，缘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王阳明显然并不能提出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复古倾向。对章学诚而言，其强调“究世变”之意图并非聚焦于史家的自主性、独特性，而恰在于阐述历史撰述须“百川归海”，支持与服务于当时的统治秩序，这显然正与清朝统治者冀图以史学维护政权巩固的内在诉求相契合，“由于是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故清朝比以往历朝立国时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都要显得严重，同时也更加迫切地需要对所有囿于‘私意’的历史书写从符合‘公意’的角度予以全面的删除”^⑧。章氏“道随世变”“圣王得位行道”的主张，亦可认为是“劝导个人私意对历史现状无奈般的屈从”^⑨，这正呼应了清朝统治者规范士人思想，强化国家控制力的目标。应当

①[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378页。

②葛兆光：《明清之间中国史学思潮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③[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390页。

④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⑤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⑥南炳文、汤纲：《明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0页。

⑦辛小娟：《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孔子研究》2015年第5期。

⑧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328页。

⑨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330页。

指出的是，章学诚生活的清朝中期“正处于‘道’达于巅峰、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①，其历史观既非回到过去，亦非眺望未来，而更多是对现存秩序的归化与服从。他对著书指摘国事行为的忧惧即凸显了这一点，“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②。章氏强调质重于文、批评以文损质，主张“圣王得位行道”，在规范史学体例和书写的同时，亦存在着损害史学独立性、阻遏思想发展的消极一面。

可见，探究由王阳明到章学诚的历史观变动，必须将二者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之中进行考察。王、章历史观的歧异，既与二者的人生历程有关，更是时代环境嬗变在士人思想领域的映射，其中正隐含着明清时期在社会建构、思想整合、文化取向等方面的变迁轨迹。

Wang Yangming and Zhang Xuecheng: Historical View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LUO Yan-jun

(The Grand Canal Research Institut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Wang Yangming and Zhang Xuecheng, as famous think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spectively, deserve a deeper explora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views. In terms of views about historical changes, Wang Yangming focused on “cultivating conscience”, while Zhang Xuecheng focused on “investigating changes in the times”. In terms of examining the intention of historical changes, Wang Yangming focused on solving real social problems, while Zhang Xuecheng focused on “using historical writings to convey truth” and conformed to the governing ideology of the rulers of the dynasty.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eople, Wang Yangming believed that “the survival of the monarch is related to the people”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historical changes. Zhang Xuecheng focused on elucidating the “Holy King’s reign and govern in his way”, aiming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isting ruling order. The divergences in historical views between Wang Yangming and Zhang Xuecheng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life journey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the intellectual field of scholars, which implies the traject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Wang Yangming; Zhang Xuecheng; historical views; the changing times

[责任编辑 如初]

^①Philip J. Ivanhoe. *On ethics and history : essays and letters of Zhang Xueche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

^②[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332页。